

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点研究项目（2015ZH01）资助

西安科技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12SZ06）资助

葛兰西

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视角

李金勇 著

Gelanxi
Wenhua
Lingdaoquan Sixiang Yanjiu

Li Jinyong Zhu

Cong Sixiang Zhengzhi jiaoyu Quanli De Shijiao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重点研究项目(2015ZH01)资助
西安科技大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12SZ06)资助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

——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视角

李金勇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渊源的考察为背景,以该理论的实施场所、主体担当、实施形式的分析为基础,系统地剖析了文化领导权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并从文化领导权的实质入手分析了文化领导权与政治合法性、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基础,并结合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分析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启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视角/李金勇著.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 - 7 - 5646 - 2938 - 0

I. ①葛… II. ①李… III. ①葛兰西, A. (1891~1937)—领导权—政治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D095.46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9283 号

书 名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视角

著 者 李金勇

责任编辑 徐 玮 黄本斌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出版服务 (0516)83885767 83884920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印 刷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0 字数 196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在葛兰西短短 46 岁的生命之旅中有长达 10 余年的牢狱生活,但这囚禁不住一个永远不肯停止思索的大脑,葛兰西思想之深邃、影响之广泛,令人啧啧称奇。

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基于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同时也是对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经典作家曲解的“经济决定论”的反叛,并结合 20 世纪初福特制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变化而提出的。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对以往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其全部思想体系的核心。作为列宁去世后对马克思主义最有独创性的理论家之一,葛兰西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讲过:“在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有谁真正从事了或继续进行了这一探索呢?据我所知只有葛兰西。……他的《狱中札记》记述了意大利历史和欧洲历史上所有的基本问题,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題。其中也对上层建筑这个今天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一些极其独到的、甚至天才的观点。此外,还有一些堪称新发现的新概念,例如关于领导权的概念,这是从理论上解决经济和政治相互渗透问题的一个卓越典范。可惜,至少在法国,有谁把葛兰西的理论努力继续进行下去了呢?”^①本书以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渊源的考察为背景,以其实施场所、主体担当、实施形式的分析为基础,系统地剖析了文化领导权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并从文化领导权的实质入手分析了文化领导权与政治合法性、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基础,结合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分析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启示。

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了本书研究的缘起和研究意义。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和理论渊源。一个人的思想理路的产生和发展,既是其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的反映,又是其个体实践活动的凝练和折射,同时还反映了其对时代主题和前人积累成果的解读和反思。现实背景包括葛兰西的生活阅历、革命政治生涯的磨难,以及他对欧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反思。理论渊源则包括意大利的本土资源和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和实践唯物主义,尤其是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思想)。第三章阐述了文化领导权

^①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第 104 页。

思想的主要内容。本章通过对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再思考,阐述了葛兰西政治国家的内涵,揭示了文化领导权的获取和建构是要靠“教育和塑造”的作用,需要被统治阶级的某种自愿赞同,通过将其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市民社会是文化领导权争夺的重要实施场所。本章通过对颇具独创性的知识分子学说的考察,分析了葛兰西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别和联系,阐述了有机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机联系及他们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有机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争夺的主体担当。本章通过对最富原创性的整体性革命战略的考察,分析了葛兰西关于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区别,揭示了西方革命论域中阵地战的重要性。阵地战、运动战的灵活运用是文化领导权争夺的重要实施形式。第四章主要阐释了文化领导权思想在葛兰西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主要特征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本章通过对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政治哲学、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内容和关系的分析,提出了在总体上把握、认识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总体性既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重要特征和真谛之所在,也是我们领会和把握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基础和前提。其次,本章从侧重从矛盾统一性视角考察问题、革命战略和策略相结合、实现非强制性统治、强调革命的总体性质、该理论适用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稳定时期等五个方面,概括了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主要特征。最后,本章主要分析了文化领导权思想对英国伯明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尔都塞、新葛兰西主义的主要影响。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权力问题的基石。首先,本章分析了文化领导权的实质,指出了“文化”和“领导权”是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有机结合,这就赋予文化以特有的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权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所有问题都是围绕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和建构的。作者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是政治领导权获得和巩固的先决条件;其次,以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探究为基础,进一步剖析了其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关系;最后,在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权力及其属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是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权力问题的深层基础。第六章阐释了文化领导权思想对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及其建构的启示意义。本章以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分析为基础,提出了构建意识形态安全防线的对策建议;并从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强民情民意的调查研究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坚决惩治腐败的发生等方面,分析了整合、协调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社会认同基础。结束语部分,对本书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作者

2015年10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8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13
第四节 创新之处	14
第二章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16
第一节 文化领导权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	16
第二节 文化领导权思想产生的本土资源	26
第三节 文化领导权思想产生的直接理论来源	36
第四节 葛兰西的反思及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产生	47
第三章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57
第一节 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市民社会	57
第二节 文化领导权的主体担当——有机知识分子	62
第三节 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形式——阵地战、运动战	66
第四章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主要特点及其影响	69
第一节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政治哲学、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关系	69
第二节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主要特点	80
第三节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主要影响	91
第五章 文化领导权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基石	103
第一节 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	103
第二节 政治合法性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	107

第三节 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基石	115
第六章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和借鉴	120
第一节 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及葛兰西转向	120
第二节 构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防线,防止和平演变	124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141
参考文献	14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缘起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者,20世纪初共产国际内部著名的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因领导意大利共产党从事反对法西斯的斗争而锒铛入狱,牢狱限制住了他的身体,却囚禁不住一颗永远不肯停止思考的大脑。自1926年底入狱,他忍着病痛的折磨,写下了2844页共计33个笔记本的文稿和论文——《狱中札记》。1971年《狱中札记》英译本第一次面世,在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葛兰西的西方革命论域中的“文化领导权”、“市民社会”两个概念,引起了理论界和学术界长期、广泛的探讨,这两个概念也成了“文化研究”分析现实的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问题的常用范式。虽然葛兰西生活的时代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鼎盛发展时期,又有别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新时期,但是他的文化领导权等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话语资源,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研究的先河,形成了所谓“葛兰西转向”。

从内部因素来看,伴随着我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国社会呈现了丰富多样、分化发展的加速态势。一方面,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由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原来同一性、匀质性的社会正在被多样性、异质性的社会所代替。阶层分化、利益多元化、政治参与的扩大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多样化解构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变化着的社会向当前的执政系统提出了制度改革和价值重构的迫切要求。

从外部因素来看,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受到了“和平演变”和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和平演变”是西方国家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颠覆战略,它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用非军事化手段,用经济封锁、政治包围,尤其是文化渗透等“软

实力”来传播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其实质就是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来达到瓦解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其中,意识形态是西方“和平演变”的重要内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上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源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①他指出,“我们同东方交往越多,我们就能使它受西方典范力量更大的冲击,甚至共产党的杰出人物也难以抗拒”。通过这些途径“播下思想的种子,这种种子有朝一日定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西方国家通过大众传媒,包括电视、电台、报纸、文学作品等,向我们传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和资本主义政治模式,同时利用经济手段进行利诱,试图逐渐削弱和瓦解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念和政治走向,从而使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理想,达到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经济全球化是我国文化安全受到的又一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不断进行商品的文化输出,特别是凭借其发达的文化产业,使西方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拜金主义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不断渗入,形成强烈的道德文化冲击。他们还利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把一些不良、低俗的文化大肆传播,扰乱思想,蛊惑人心,使人们在复杂的文化道德交往中找不到民族向心力,甚至崇洋媚外,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形成巨大的冲击。

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如何利用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进一步构建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重新审视和挖掘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的产生、内容、特点、演变,对我国现在及今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意义

(一)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的理论意义

第一,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挖掘和探究。

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有目的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是个体社会化生成的需要和社会群体整体利益维系、发展的要求两者之间内在张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其终极的指向性还是为了人、培育人,不断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列宁的灌输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等均属于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的元理论。

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的掌握不在于怎样夺取“领导”的问题,而关键之处在于争取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权——“话语权”。没有什么权力是先前给定的,所有的

^① 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② 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一切都需要我们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证明。只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从内心接受了你的存在,认同以至于同化了你的价值理念,一个社会政权才能够在政治上存在或者不被替代,领导权才能够被接受。葛兰西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深刻剖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变化,重新思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明确提出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借助于教育,通过人们的自觉认同,在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权力支配功能。换言之,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合法性,是通过教育活动或行为使其灌输的文化专断得以再生产出来,从而实现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统一,而意识形态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权力支配功能。由此可见,领导权的获得是一个争取和建构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教育问题。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探究,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思考思想政治教育权力,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社会经济政治建设的保驾护航功能,提供了观察问题的新视角和重要的理论启示。

第二,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从法理上深入探究政治合法性问题,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重要意义的理解。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历经考验而发展和巩固起来的。这一点充分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趋向性与主体选择性的辩证关系原理。从现实性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而从理论上对其进行学术探究,仍然是非常必要的。目前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学理、法理的探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有许多尚待开发和拓展的空间。本书从思想政治教育权力的视角,立足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实质的分析,揭示文化领导权与政治合法性的内在联系,尝试从法理上探究政治合法性的深层基础,并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构即意识形态安全分析其理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的符号和象征,意识形态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意义。研究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在新时期、新阶段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葛兰西在分析当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远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文化自觉,而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行使文化领导权”。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经历万劫而活力犹存,就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已经被深深根植于被统治阶级的内心,变成了人们的一种常识和集体无意识。只有唤醒无产阶级被蒙蔽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在文化领域展开反对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斗争,破除其现有统治的合法化外衣,建构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革命胜利的曙光才有可能普照大地。因此,文化领导权思想也是葛兰西全部思想的核心和精髓。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动力与核心价值,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

是民族生命的灵魂和根基。由于意识形态影响着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长远的、深刻的,所以意识形态安全是深层次的国家安全,是民族得以传承、国家得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如果失去意识形态的主导力,就等于失去灵魂,失去赖以凝聚的精神力量。一个国家如果精神支柱锈蚀坍塌,文化阵地弃失,意识形态安全的警觉性低,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就弱,必然导致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规范的混乱,从而引发和加剧社会风险,从根本上损害国家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相互交流、渗透、冲撞和融合,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像今天这样的经济繁荣,也很少出现像今天这样的文化跃动,如不正确对待,很容易使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失去其社会主导地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 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日渐突出地摆到我们面前。如果对这个 问题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从战略高度树立意识形态安全观,强化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加强意识形态安全防范,那么本域文化的失守势必将危害国家的生存发展。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重要特征。经济全球化,政治一体化,对全球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有关文化的问题已成为全球状况的一个构成特征。面对普遍建立的全球化交往,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各国的普遍交往所塑造的千姿百态的文化景观中内蕴着的各种力量(如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历史因素等)所形成的多层面、多方位的复杂结构中,全球化本身的背后也隐藏权力的角逐、物质利益的纷争。“文化”早已不再是一个仅仅关于人类精神理想的产品。特别是在当代,政治渗透往往被认为是带有强制接受的烙印,而经济渗透往往又被斥责为自私和强制,只有文化交往才意味着无拘无束的思想交流。因此,推动和维持全球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凭借着 自己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把自己的民族文化标榜为世界性的、普世性的文化,鼓吹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目标,大肆进行文化的扩张,大量地输出其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重要手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本国发达的经济军事实力,加紧对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试图通过“和平演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使非西方国家接受、认同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而达到同化非西方国家的目的。所以,面对社会文化呈现出中、西方文化共时共存,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文化共存,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同时并存的态势,怎样擦亮我们的双眼,甄别良莠,充分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内外认同基础,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探究的课题。

第三,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拓宽视野,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精神”的理解。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和生命力就在于其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汲取生活的营养,进行深入的概括总结,并成为我们进一步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现实世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缘起于其实践哲学,也是实现其实践哲学的重要策略和途径。透过文化领导权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在反思、总结当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教训,从理论上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式理解的基础上,结合西方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的理论结晶。麦克莱伦指出:“马克思主义那种革命的热情和变革的要求同历史的视角与对科学性的宣称联系起来的罕见能力,使它显得与众不同。然而正是这样,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思想就几乎不可避免地被简单化、僵硬化和教条化了。马克思主义成了千千万万信奉者的简单信念,给他们灌输了最后胜利的信心。这就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后果,它们离马克思最初思想越来越远,并成为一种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①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曾经给我们造成了多次的灾难性后果,几近葬送了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一度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究竟与马克思最初的思想是否一致?两者之间有没有距离,距离有多远?我们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论,为什么、怎样能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其间的一系列中介是什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是生动的、鲜活理论,它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教条,其全部理论的旨趣就是通过解释和改造现实生活,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及整个人类解放。

第四,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国内学界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热点问题的研究,首先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创者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思想的影响,其次是国内以往的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条块分割化,最后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要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并非仅仅关注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虽然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居于主导地位,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葛兰西语境中领导权的总体意蕴,也就是说,领导权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总体性建构。葛兰西谈到自己主张的经济意义上的领导权与经济决定论的区别时指出:“经济主义对政治和知识分子的意志、行动和创造方面的表现所抱的态度,至少可以说是很奇怪的,——仿佛这些表现并不是经济必然的有机产物,而且也不是经济的最有影响的

① 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表现似的。因此,一旦具体提到霸权问题,就把它说成是某些集团寻求霸权,这样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毫无疑问,对各个未来的被领导集团的利益和倾向必须予以考虑,必须达到某种妥协以求得平衡,——换句话说,领导集团要做出经济团体性的牺牲,这些固然都是霸权问题所包含的前提,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这些牺牲和妥协绝不可触动根本,要知道,霸权虽然是伦理—政治的,但也必然是经济的,它的基础必定是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核心决策方面所起的决定性职能。”^①此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总体性特征,还表现在它与鲜活的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内在、总体性的联系。这种联系方式绝不是事先给定的或者预设的,而是通过主体的参与并借助于主体的对象化活动建构和实现的。葛兰西思想的总体性意蕴,对于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认识和研究,克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式”的解读的弊端,用活生生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熟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其理论意义也是重大的。

(二)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的实践意义

第一,加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防止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意识形态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它既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它在维护政权的合法化、推动大规模社会政治动员、实现政权的转移等方面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意识形态安全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通过自身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建构,能够抵御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使其长期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意识形态历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石,其思想实质就是论证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非强制性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本特征。正是通过大众的心理认同和社会认同,统治阶级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得以维系和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获得了合法性的基础。领导权的获得既是一个生成过程,更是一个建构过程。从文化领导权语境研究、审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随着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争斗更加激烈,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凸显。对此,邓小平早就明确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的、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②

第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

^①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London 1971, p. 161.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力,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在经济、科技、政治领域,更明显地体现在以文化为表征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既是一个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和建构,同时又是整个社会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还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至关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认为:“在国际政治中通过制定议程来吸引他人,与通过威胁或使用军事或经济手段来强迫他人改变立场同等重要。我把实力的这一方面称为软实力。它可以拉拢他人,而不是胁迫他人。软实力依赖于制定政治议程并使之成为他人所喜好的议题的能力。……安东尼奥·葛兰西早就明白力量来自设置议程和决定辩论的框架。决定他人喜好的能力往往同无形实力资源联系在一起,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等。如果我能让你想做我想做的事,那么我就不必逼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想效仿的价值观,那么我们领导世界所付出的代价会变小。”^①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讲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当今主宰这个世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正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任何借口时代变化,淡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争的论调都只能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尽管近些年来,一些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不断在叫嚣“超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的终结”等论调,但是从实质上讲,这本身就体现了旨在为资本主义社会辩护的意识形态,也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支配世界话语权的一个最好例证。法国知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鲍德里亚曾经讲过:“我们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政治的终结’、‘社会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其实是没有一样是真正发生的。最糟糕的恰恰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终结,一切都会滞后,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不断慢慢地、无聊地、反复地展开。”^②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并在实践中不断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和国际认同基础,不断激发全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及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中国梦。

第三,审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不断夯实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的社会认同基础。

葛兰西早就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要在革命时期开展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破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外衣,即使革命胜利之后,仍然要不断巩固和建构文化领导权,设法赢得广大民众的社会认同和心理认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她始终坚

①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门洪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② 克里斯多夫·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并注重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党和国家的命运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机连在了一起,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今天,中国共产党担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创新、文化领导权的建构是关乎社会主义命运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的表征。中国要实现近代以来孜孜以求的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②因此,审视我国目前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断加强文化体制的改革力度,兼收并取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精华,真正把人民的利益上升为国家的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用先进的价值理念和导向引领社会风尚,弘扬正能量,不断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学界对葛兰西的研究始于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荣誉学部委员徐崇温先生是我国较早研究葛兰西的国内学者之一。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保卫唯物辩证法》一书,该书用3页的篇幅介绍了葛兰西。

① 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② 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1982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徐崇温先生用专门的一章介绍了葛兰西的生平和主要思想观点。徐崇温把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加以引介,并把其哲学倾向定性为唯心主义。1983年葆煦根据俄文《葛兰西选集》翻译的《狱中札记》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涵盖了葛兰西《狱中札记》的主要内容。1984年,田时纲发表了《葛兰西与唯物主义》(上海《社会科学》,第12期)、《论葛兰西哲学思想的倾向性》(《哲学研究》第9期)两篇论文,阐述了葛兰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哲学倾向是实践唯物主义。其后他又连续著书(《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下卷,合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合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合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

自1985年开始,国内学者对葛兰西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拓宽,并对其哲学思想给予高度评价。郑楚宣连续发表了四篇论文:《葛兰西“实践一元论”和“绝对历史主义”试析》^①、《葛兰西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②、《略论葛兰西的“历史总体”思想》^③、《葛兰西的“总体性政党”理论》^④。另外,还有敦庸的《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吗?》,周建农的《西方国家中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探索》,俞吾金的《葛兰西文化观及其启示》,陈小平的《试述葛兰西建党思想的特点》,徐均光的《知识分子和现代社会》,马云的《葛兰西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陈炳辉的《试论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周乐华的《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积极意义》和鲁俊峰的《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述评》等。1983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吴高翻译的《葛兰西传》(原书作者是意大利学者朱塞佩·费奥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在这期间,毛韵泽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研究葛兰西的专著《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求实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该书对葛兰西的生平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主要侧重从国际共运史的角度来讨论葛兰西的,因此,对葛兰西的哲学思想分析得尚不够充分,对于后来学术界所讨论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文化霸权理论等内容论述得也较少。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内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还交织着实践唯物主义的论辩。学界的这场论辩也涉及对葛兰西哲学思想、政治学思想的属性和评价问题。总体来看,这个时期国内学界对葛兰西的研究还深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没有跳出哲学属性上两分法的影响,不管在研究广度、深度,还是在质量、数量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① 郑楚宣:《葛兰西“实践一元论”和“绝对历史主义”试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② 郑楚宣:《葛兰西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现代哲学》,1986年第2期。

③ 郑楚宣:《略论葛兰西的“历史总体”思想》,《现代哲学》,1987年第2期。

④ 郑楚宣:《葛兰西的“总体性政党”理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国内逐渐掀起了一股研究葛兰西思想的热潮。研究范围也从原来的哲学、政治学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导权领域;先后出版发表了一批译著、专著、学术论文。1990 年,徐崇温翻译了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同年,俞吾金、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编译的《葛兰西文选(1916~1935)》;1993 年,俞吾金出版了一部专著《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书中他较早地对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进行了引介和述评,并指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质是一种教育关系,而先进知识分子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何增科先生从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角度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葛兰西和市民社会的概念》(诺伯特·巴比奥、何增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3 年第 2 期)、《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述评》(何增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3 年第 2 期)、《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葛兰西的理论》(何增科,《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 年第 4 期)、《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何增科,《中国社会科学》1994 年第 5 期),这在当时的国内学界还为数不多。此外,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相关的学术论文主要还有:陈燕谷的《文化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瞭望》1995 年第 19 期),刘康的《文化霸权与文化革命的谱系学》(《花城》1996 年第 5 期),戚吟的《知识分子与革命——论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江淮论坛》1996 年第 1 期),徐崇温的《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3 期),葛扬的《社会进步的文化动力观——葛兰西与毛泽东之比较》(《社会主义研究》1997 年第 4 期)等。虽然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向文化领导权领域拓展,但研究的广度、系统性及水平仍显不足。

进入 21 世纪后,国内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文化哲学、意识形态领域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学科的渗透和交融情况,译著、专著进一步出版,学术论文的数量、质量进一步提高,相关学术性会议也在不断举行。自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在中国知网上输入篇名“文化领导权”,查找到的相关论文有 213 篇;输入篇名“葛兰西”,查找到的论文有 566 篇;输入篇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查找到的论文有 35 篇;输入“葛兰西文化霸权”,查找到的相关论文有 20 篇;输入篇名“葛兰西”,查找到的博士论文有 7 篇,优秀硕士论文有 80 篇;输入题名“文化领导权”,查找到的博士论文有 5 篇,优秀硕士论文有 31 篇;输入“文化霸权”,查找到的博士论文有 4 篇,优秀硕士论文有 48 篇;输入“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查找到的博士论文有 3 篇,优秀硕士论文有 12 篇;输入“葛兰西文化霸权”,查找到优秀硕士论文有 5 篇。2000 年 10 月,曹雷雨等人编译出版了《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相比较 1983 年由葆煦翻译的版本,新版本删除了第三部分“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中的第 383~417 页的“福特主义和美国主义”相关内容。2003 年,中国政法出版社出版了英文影印本的《葛兰西狱前著作选》。2006 年